

《庚子北京避难记》的作者及其史料价值

戴海斌

出于一次偶然,笔者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图书资料室里翻到一本小册子,封面书签题署“庚子北京避难记”,板框高195毫米,宽125毫米,内页毛边纸,半叶八行,四周双边,框外左上题“状元及第”,左下题“景元斋”。全篇小楷抄写,约七千餘言,分上下卷,不署作者,前后无序跋。检索卡片登录信息为:“《庚子北京避乱记事》,光绪中抄本,一册,登记号:4022244。”经过研读,笔者发现这是一部义和团运动期间一位下层京官逐日记载的见闻录,上卷主要记京师义和团活动之情状及作者本人由京返乡的“避难”经历,下卷综论庚子事变缘起、经过与结局,对相关重要事件和人物多有评议,时段起自庚子(1900)五月,迄至辛丑(1901)正月,疑为原稿本,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经查,此书向未有刊本,亦未经著录^①,有关义和团研究的各类公私著述未曾提及,故有介绍披露之必要。

此书上卷篇首有题记,录于下:

庚子之变,衅起团教不和,以致衅开仓猝,神京不守,生民涂炭,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予承乏兵曹,事皆目击,萃华西狩,百官离散,流离困苦,徒步出京,幸而出险,谅由祖宗默佑,痛定思痛,不可不有以志之。

又下卷一段涉及作者生平履历,有谓“予自光绪丁丑年到部当差,十五年奉先大夫讳,十七年服阙供职,计在部实资二十年,再二三年可望补缺”云云。按,“兵曹”即兵部,“光绪丁丑”即光绪三年(1877)。从上自述可知,作者于当年分发到部,十五年(1889)丁父忧离职,十七年(1891)服满回任,若刨去守制三年,截至庚子事变发生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其在部供职实满二十

^①目前搜罗最富、范围最广的两种义和团研究书目,即翦伯赞编撰:《义和团书目解题》(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义和团》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中国义和团研究会整理:《百年论著目录》(收入苏位智、刘天路主编《义和团研究一百年》,齐鲁书社,2000年),均未见著录此书。

年。据此,初步可判定作者为一位挂名兵部而久滞于仕进的老司员。

书中五月初一日条记:“访同乡曹根生驾部(允源)、邹紫东仪部(嘉来)”。按曹允源(1855-1927),字根荪(生),号复庵,江苏省苏州吴县人,光绪十五年己丑科(1889)进士,历任兵部主事、员外郎、汉阳府知府、安襄郢荆兵备道等,授光禄大夫。辛亥革命后返苏州,任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长,主持纂修《吴县志》^①。邹嘉来(1853-1921),字孟芳,号紫东,江苏省苏州吴县人,光绪十二年丙戌科(1886)进士,改礼部主事,十八年(1892)兼充总理衙门章京,二十七年改任外务部庶务司主事,累迁至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授弼德院副院长。民国后,以遗老自命^②,著有《仪若日记》等。

五月二十日条记:“予时在延寿寺街长元吴会馆。”按,“长元吴会馆”即苏州府属之长州、元和、吴县三邑会馆,延寿寺街位于宣武琉璃厂东街东侧,街以延寿寺庙得名,今仍存其名。十一月初八日条,又有“安抵苏州”等语。

综合以上几条,可知作者籍贯为江苏吴县。查《大清缙绅全书》庚子之部兵部衙门名录,隶籍江苏吴县者有两人,一作“武选司,郎中曹允源,江苏吴县人,己丑(进士)”,一作“额外司员,主事费德保,江苏吴县人,监生”。^③至此,可确定作者为费德保。

关于费德保现存资料极少,其生平难以详考,目前只能拼凑一些零星的记载,略事钩沉。江南费氏源自山东的邹城、费县地区,宋代南渡时,徙居于苏州郡城,继有一支迁至西山后埠,族称包山支。费德保家族以行医、经商闻名乡里,在西山置有义田二百五十亩,祖辈以孝德感动朝廷,嘉庆帝颁旨褒奖“笃行淳备”,并赐建孝子牌坊。费德保为费氏第十四世,在后埠村亲建费孝子祠,至今遗迹仍存^④。光绪十三年(1887)四月,总理衙门奏请派遣官吏出国游历,费德保以“兵部候补主事”身份,考取第十五名,时年四十一岁^⑤。按传统年岁计算法推算,则其生年大致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又,费氏表字芝云,与恽毓鼎(1862-1917)交善,于《澄斋日记》中常有出现,被呼为“费芝云丈”^⑥。晚年

①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编:《江苏艺文志·苏州卷》第2分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56-1457页。按,书内称曹为“(光绪)十二年进士”,误。

②陈三立:《清故光禄大夫外务部尚书邹公神道碑铭》,李开军点校:《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46-1048页。

③《大清缙绅全书(庚子夏季)》,荣禄堂印行,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暨古文献研究室编:《清代缙绅录集成》第68卷,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④《“费孝子祠”笃行淳备》,出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227d5c0102duio.html,最后浏览日期:2013年4月25日。

⑤《申报》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二日,转引自肖宗志:《候补文官群体与晚清政治》,巴蜀书社,2007年,第205页。

⑥分见戊戌年(1898)十月十七、十一月初六、十二月初十,丁未年(1907)九月廿四,戊申年(1908)五月十七、五月廿四,癸丑年(1913)十月三十日诸条,载恽毓鼎:《澄斋日记》上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73、175、178、354、385、386、669页。

旅居上海,民国时一度任洞庭西山旅沪同乡会董事。其人工诗善书,曾为吴县角头司巡检暴式昭题《林屋山民送米图》^①,现苏州狮子林“揖峰指柏轩”内亦存有他题写的长联^②。叶昌炽《奇觚廋诗前集》、《奇觚廋遗词》等录有与费氏唱和之作,内称其为“费芝云兵部”^③。

将《庚子北京避难记》与《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中“费德保题诗”两处字迹书法进行比对,相似度极高,似可推断前者系出于费氏亲笔,应属稿本。

又据笔者了解,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于1956年,1959年划归上海社会科学院,即今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从苏州旧书肆收购过为数不少的旧书古籍,《庚子北京避难记》很可能就是那时入藏本所图书资料室的。

二

《庚子北京避难记》上卷基本按时序叙事,主要记义和团入京师后种种见闻及“避难”返乡之全程经历,起自庚子五月初一日(1900年5月28日),迄于同年十一月初八日(1900年12月29日),凡所记事多有明确系日,并作有感事诗七律四章。下卷则综论庚子事变之缘起、经过与结局,多穿插有主观性评论,其中涉及对荣禄、奕劻、载漪、徐桐、崇绮、许景澄、袁昶等人的看法。篇末附录了庚子七月二十六日至辛丑正月初六日若干重要的清廷上谕及辛丑条约议和大纲。

在费德保的记述中,约自五月初,已有义和团涌入京师。至十五日(6月9日),“遍街皆拳民,首扎红布,手持利刃,日夜焚烧教堂,搜杀教民,三五夜城外火光烛天,而市面居民尚不惊动,识者已知乱之难戢矣”。二十日,拳民火烧老德记洋药房,火势延及前门外大栅栏地区铺户民宅数千家,当时费德保所在之延寿寺街长元吴会馆,“相距不过半巷,幸未殃及”。二十三日(6月19日),清军与义和团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炮声隆隆,彻夜不绝,路断行人”,费氏自记:“予在馆耳闻炮声,日坐针毡,与同馆蒋光禄(恩溥)、金孝廉(文樑)互相叹息而已。”

六月初,拳民四处杀抄教民,并有波及无辜,京城秩序因之大乱。其时出现一个情况是,“官眷皆避乱出城,有至通州暂避者,有至京北延庆、昌平等家去者”。经与同乡京官曹允源、邹嘉来商量,费德保决定“以眷属出城为宜”,并蒙

①钟叔河编订:《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岳麓书社,2002年,第90-91页。按,林屋山即今太湖西侧之洞庭山,同书内曹允源亦有题咏。

②潘君明:《苏州楹联辑赏》,古吴轩出版社,2010年,第90-91页。

③叶昌炽:《题费芝云兵部山寺品泉图(甲午)》、《木兰花慢·费芝云兵部感怀词六首,悼其亡姬作也。出以见示,为赋此阙》,分载于《奇觚廋诗前集》、《奇觚廋遗词》,《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57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44、267页。

廖寿恒(1839-1903)、陆润庠(1841-1915)、陈夔石(1857-1948)等人赞助川资,遂成行。文中记述此行:“所有书籍磁器均不敢带,仅带随身衣包,雇大车一辆,价四十四金,于十一日(7月7日-笔者注)同曹、邹两家眷口起身赴保定,沿途拳匪林立,幸而获免,于十四日(7月10日)抵保定,暂租民房三间小住。”

至七月初,“适有便车至京,又奉严旨,司员告假者扣资”。按六月十八日(7月14日)有明旨:“现在各部院衙门当差人员,纷纷告假,殊属不成事体。著各该堂官查明,如未经告假,私行出京人员,著即行革职。其已经递呈告假者,将来到署销假,著将各该员前资注销,以示惩戒。”^①费德保奉旨后,不得已又孤身返京,仍寓于长元吴会馆。时八国联军逼近京师,七月十八日(8月12日)一早听闻“乘舆已动”,即宫廷西狩之谣传,费氏决定再次奔往保定:

予单身出彰仪门,乱军与拳匪到处林立,于枪林炮雨中徒步至卢沟桥,已有拳匪奸民把守,空行人尚可经过,一路妇啼儿哭,惨不可闻。天晚至长辛店,适同乡陆凤石侍郎、徐花农学士亦踉跄而至。十九日,各雇一人推小车,经五日到保定,不堪其苦,幸天佑得免于难。

二十二日(8月16日)到保定,途遇刑部主事王仪通等人,知“乘舆于十九日出城,有云从易州而西,有云由宣化,不知确耗,洋人于二十日入都”。至此,京师已陷落,慈禧太后偕光绪帝西逃,费氏因有“国破家亡,真可痛哭”之慨。

费德保在保定并未待多长时间,考虑到“困守印曹,本无积储,出京川资幸廖、陆诸公资助,抵保匝月,囊橐如洗”,加以“保定逃兵四集,又无重兵驻扎,决非善地”诸种不利情况,即于七月廿七日(8月21日)偕眷投奔邯郸捕署蒋兰生内兄处。八月初二日(8月26日)抵邯郸,不到半月,又应大名府知府戴锡钧之邀,于本月十八日(9月11日)转赴大名府署,暂充记室。

当时八国联军由京开赴直境各地,四处侵扰,费德保以“寄迹郡城,萍踪不定,本非久计”,于是作南旋之计。九月初八日(10月30日)启程,十二日抵长垣县,廿八日(11月19日)抵开封,蒙河道总督任道镕(1823-1906)赠赆五十金,得以解决旅费。十月十一日(12月2日)抵亳州,二十二日抵清江,二十六日雇船下驶,三十日抵瓜洲。十一月初一日(12月22日)渡江,初八日(12月29日)安抵苏州。上卷末,费氏总结南下一行:“此次避乱,于六月十一日出都,十一月初八日抵苏州,约计半年,在途琐尾流离,不堪言状,且到处川资困乏,沿途乞钵,皆承诸世好亲友相助,敬当志之,不敢遗忘。”

^①《大清德宗皇帝实录》卷四六五,光绪二十六年六月戊子,《清实录》第58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第93页。

据文意推断,费德保在返回家乡后不久写作此篇,约辛丑(1901)上半年,逐日载录在京及南下途中见闻,多出于身历目击。如五月初一日记:“散值,访同乡曹根生驾部(允源)、邹紫东仪部(嘉来)。入门时,紫东神色仓皇云,良乡、涿州一带义和团滋事,聚有数千人,将保定一带铁路焚毁,人心惶惶,是为滋事之始。”文内追记友人言论,提示了当时京官所感受到的义和团事变的起点,有助于将今天的读者带入历史现场。五月初九、十日,清廷相继派出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翹、协办大学士刚毅赴涿州“察看”并“劝散”义和团。时任日讲起居注官的恽毓鼎后来指出,此举“名为宣旨解散,实隐察其情势”^①。费德保记其事:

……诏派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翹,往涿州一带,劝谕解散。其时拳民汹汹,有不肯奉诏之意,朝廷又遣大学士刚相(毅)往谕,拳民以忠义自命,刚相颇为所惑,回朝时以人心可恃、众志成城等语,动摇天听,并不计形势之强弱,兵事之利钝,而拳民亦自命为国宣力,遂数十成群,陆续进都门,毫无忌惮,门禁亦不严。

复按清宫档案,刚毅回京复奏时确有“蚩蚩之众,诛不胜诛。诚如圣虑,非推诚布公,剴切晓谕,使知悔改,不能期其相安,断无轻于用剿之理也”等语^②。费氏视刚毅涿州一行,为清廷政策由剿转抚、拳民大量进京的关键,这一观察包含相当的洞见。

义和团入京前后,费德保全程目睹。有关团民设坛施法、降神附体种种行状,多见于笔记,往往有过简或过谑之失。费氏所记则富于细节,可谓详明生动:

拳民到处结坛,名为不贪财、不爱色,然到处募缘,或令送米面,或令送钱帛手镯,居民亦不敢不应。初愚民以拳民为可恃,及至勒索财物,亦渐知其不可恃矣。最可笑者,坛中朝夕焚香,以神附体为言,或曰赵子龙,或曰孙猴,并以能御刀刃、能避枪炮欺诳于人。盖以气炼御刀刃,自古易筋经法有之,偶有一二人习之,亦不足为异,至能避枪炮,则迅雷烈火,谁能御之?此可不辨而明者。并对空放火,云不必动火,用咒一二语遥拜之,则烟自屋中生,人皆神异,以为天助,其实皆并未目击也。

所记不少事情为费氏及身边亲友所亲历。如兵部主事程绍祖、工部郎中潘盛年为拳民强行“跪坛焚表”,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黄思永为拳民“诬以吃

^①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47页。

^②协办大学士刚毅等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第137-138页。

教”等记载,其来有自,非常值得参考:

拳匪之可笑,令人喷饭。五六月中,气焰方张,动辄以神降为言,每一街一巷,必立一坛,有可疑之人,必执赴坛中,令其执香焚表,以辨是教民与否。予妹丈程菊村驾部^①,在街换银,忽执之去,令其跪坛焚香,据云中设一黄帏,内有一人,牵呵梦呓,如南中巫师之类,忽作小语云“他非教民,可以放他”,则令之去。若云“是教民”,则不待辩而诛之。同乡潘经士水部^②出城,亦为执去,推挽半日,亦令焚表,几及于难。如此之类,不一而足,甚至如黄慎之学士(思永)、立山尚书,均为执去,诬以吃教,亦有为挟仇诬告者,此数日间道路以目,重足而立,不成世界矣!官更不敢过问,岂非国亡之妖孽乎?^③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义和团焚毁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西药房,火势失控,延烧民居,被焚之户数以千计,正阳门城楼亦为烈焰扑及。这是义和团运动期间颇具影响的一个事件,有些著述谈及此事,只讲火烧老德记西药房,对殃及民房事加以讳饰^④。据费德保记载:“大栅栏有一中西大药房,名老德记,其中西药居多。拳民以灭洋为名,凡有外洋货物店,皆欲一焚以张其势,特来拳民数十人焚其店,不料起火之后,势成燎原,大栅栏为戏楼、饭店会集之地,高楼巨屋,比栉相联,火遂四延,不可救止……火光焰天,烧至竟日,黑烟障地,瓦砾盈堆,各铺户居民纷纷逃窜,哭声震耳。珠宝市二十四家银炉房,尽付一炬,莠民乘机抢夺。锦绣世界,一刹那付之灰烬,可为浩叹!”至于火势蔓延的原因,现存史料有一些反映,如谓“义和拳说专烧奉教、不连别家”^⑤、“大师兄自以为神火不延烧……披发念咒,而火不能止”^⑥、“及至延及旁处,团民不许扑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无虞,切勿自生慌扰,既至火势大发,不可挽救”^⑦等等,惜多语焉不详。费氏则明确记载京师街坊常设水会,本具有一定消防能力,此次火势

①程绍祖,字菊村,江西新建人,监生出身,时为兵部主事。

②潘盛年,字经士,江苏长洲人,附贡出身,时为工部郎中。

③又,避难保定期间,费德保目睹保定拳民以“吃教”为由公然执拿官差,为另一显例:“保定拳匪亦甚鸱张。有一保甲委员忽为执去凌辱,幸伊安徽同乡在藩台处公禀,廷方伯两次遣人索之,不肯放回,后用令箭派武员调之,方始释回,已受辱不堪。询其故,方知数月前有一局役,为公事责革,该役挟仇,告以吃教,故有无端之祸。后该员不敢在省,他去,方保无事,亦险矣哉!官场如此,平民可知,宜其人心惶惑,朝不保暮矣。予在保时所亲见者。”按,“廷方伯”即廷雍(?-1900),时任直隶按察使,署理直隶总督。

④参见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编著:《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齐鲁书社,1986年,第163页。

⑤仲芳氏:《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第14页。

⑥黄曾源:《义和团事实》,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第129页。

⑦《石涛山人见闻志》,《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76页。

蔓延至不可救药,与水会受阻未能发挥作用多有关系。这不仅提供了细节的解释,也保存了社会史研究的珍贵材料:

最可恨者,火起之初,有水会持水龙来救,拳民不许,云神火令焚洋房,如来救者,即同党杀之,人皆退避,因此势成燎原。及晚火势不熄,拳民中亦有顾忌者,遂云坛中神降,令水会来救,而水会方敢至,于是水龙四集,方始救息。都中城内外而有水会,而救火极电捷。前数日中拳民焚教堂教民屋,单焚一处,火不旁及,所以愚民信之。不料此次竟延烧二千馀家,至是愚民方知拳民之不可信,而神道之不足恃矣。不胜三叹!

自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起,武卫中军、董福祥甘军偕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久攻不下,使馆区周边官民住家却大受其害。既有研究多将京城秩序大乱归咎为拳民,实则据费氏所见,官军为害极巨,甚或还在拳民之上:

及天明,方知是晚内城东单牌楼一带,官宅民居大半为乱兵抢劫一空,其最著者,徐中堂(桐)宅、曾袭侯(广奎)宅、孙中堂(家鼐)宅、钱尚书(应溥)宅,均被劫掠一空,幸未伤人。孙为予戚,见其少君景周驾部^①,据云身无长物,惟穿一单褂逃出,行同乞丐,亦自来未有之奇事也。各铺户商店,如桂林轩等铺,不但遭劫,并且伤人。盖战时有教民逃避至该铺中者,而董军寻踪追及,互相轰击,玉石俱焚,不辨其为良民、为教民也。是夜遭劫者数百家,遭难者数千人,可谓浩劫,幸城外尚晏然,而终夜不安枕矣。

关于清军的扰民劣迹,可在档案中得到印证。事后御史郑炳麟奏劾董福祥部称:“自二十五、六两日,甘勇焚杀抢掠,情同叛逆。附近东交民巷一带,假拏教民为名,无一不被抢之家。臣寓二条胡同,被抢者二十馀家,受伤而死者,若刘姓、董姓、周姓三家,共计十八名口之多……此等兵勇,以之御敌则不足,以之殃民则有馀。百万身家性命,其将何以聊生耶!”^②两相对照,足证费氏所言非虚。

七月初三日(7月28日)、十七日(8月11日),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先后被清廷处死。关于五大臣死状,学界已见专门的研究^③,而《庚子北京避难记》可以为此提供新鲜史料。如许景澄临刑前曾遗嘱三事,公私兼顾,此节不见于他处,实属珍闻:

许竹笈少冢,自承上泣谕后,已慄慄畏祸,不知七月初竟兴大狱,有似汉之晁错。临赴西市时,有人遇于宣武门外大街,囚车略停,许公呼其仆取纸笔,有遗嘱。当时匆匆,即在纸铺中取一纸,许公书三事,付其家:一云所

①孙家鼐(1827-1909),字燮臣,安徽寿州人,咸丰九年状元,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时为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其子孙传葵,字景周,荫生出身,时为兵部主事。

②御史郑炳麟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8页。

③陆玉芹:《穿越历史的忠奸之辨——庚子事变中“五大臣”被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81-201页。

有历年办铁路票据在某筐中；一云某姬有遗腹，如得一男，好为抚养以继嗣续；一云我伏法后，即令家人赶即收尸，不致迟误。

又记徐用仪死后，其婿周镜渔为之收殓，亦为其他史料所未载：

十七日，徐小云尚书（用仪）、立山尚书亦骈斩于市，罪案不明，人皆冤之。小云尚书，久列正卿，年逾七十，一朝遭此惨祸，天下惜之。是时乱势正亟，尚书正法后，竟致无人收尸，幸其婿周镜渔比部^①在京，翌日为之殓斂，而和局至此，已决裂不可收拾矣。

除留心记载时事外，对于事变之由，费德保同样有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他认为“此次之乱实非朝廷本意”，而主因在于“端邸不甚熟悉夷情，又惑于拳民之足恃，以为人心之固，不难灭此朝食，故摇动天听，决计开战”。实际上，这是对从“己亥建储”至“庚子拳变”整条线索的检讨，其中端郡王载漪与庆亲王奕劻、大学士荣禄之间意见冲突，尤其受到他的重视：

端郡王（载漪）系惇亲王之子，宣宗之孙也。去冬所立大阿哥，端王之子，于今上为从侄。自简立后，去冬上海电局绅经君^②，邀集千余人，电奏请归政，亦有外洋流寓绅商。此事深触慈官之怒，而端郡王更不悦焉。外间颇有废立之谣，又恐各国借端问罪。此次开战，故端王立[力]主其议，如熟悉洋务之庆亲王、荣仲华相国，均不以为然，召对时与端邸相互抵牾，几至廷争。而端邸又以为拳匪可恃，故坚持定见，谓侥幸一胜，从此外夷可不干预中国政事。孰知强弱利钝，已成积习难追之势，以朝廷为孤注，是谁之咎欤？

近有学者撰文对奕劻与义和团关系提出新解，质疑学界关于奕劻对义和团持反对立场的既有认知为“误读”、“无稽之谈”，并认为“奕劻和徐桐、载漪等人完全是一个营垒的”，而慈禧太后在用人态度上亲奕劻而疏荣禄^③。作为事变亲历者，费德保以奕劻、荣禄均为“熟悉洋务”之人，而政治见解与端郡王“相互抵牾，几至廷争”，类似记述为我们重申端、庆、荣三者之间关系，及慈禧太后最后倒向主战的决策背后那一层“归政”潜因，提供了极佳的第一手素材。

综上所述，《庚子北京避难记》所载时事多具本原，描摹世态亦入情理。当然，文中所记亦偶有非作者亲历而属道听途说者，有不尽确处。如记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之死：

乱之初起，各使馆尚持两端，朝廷亦有意和局，曾遣译署堂官委曲调停。五月十九日，有德国公使克林德坐轿赴总署议事，不料行至东四牌楼

①周祥珏，字镜渔，浙江人，荫生出身，时为刑部主事。

②经元善（1840-1903），字莲珊，浙江上虞人，时任上海电报局总办。

③孔祥吉：《奕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庐山真面目》，《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对孔文观点的商榷，详拙文：《也说义和团运动中的奕劻》，《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

大街,忽值董军及武卫军队。该使臣轿前有洋兵十余人,手持火枪护卫,而该使臣手执小枪,乱军忽谓其开枪,遂一哄而进,不分皂白,洋兵皆四散,该使臣遂死于乱军中矣。公法凡害及使臣者,决计开战,于是不可收拾矣。有云是董军门之意,然当时人心不靖,军无纪律,以致酿成不解之祸。虽曰天意,岂非人事不善欤?

所记于细节处稍有误,杀克林德者,非董福祥甘军,而为京师神机营营官恩海;然而描述宣战之际中外交涉情形仍大致属实,对于今人复原克林德被杀时刻的背景氛围,不失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

翦伯赞先生为“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之一《义和团》作序,谈到存留到今天的有关义和团运动著述的作者,“大抵都是官僚、绅士、教徒,也有帝国主义份子”,然尽管如此,从这些著作中,仍然可以看出人民的反帝斗争、清朝统治者的欺骗与投降,以及帝国主义者的罪行^①。如暂抛开这段话里面因囿于时代而附带的政治说教气味,取其史料解说的视点,那么,对于《庚子北京避难记》这一件史料的价值,也可作如是观。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最后想就费德保其人再多说几句。从政治立场看,如同翦先生所言的那类官绅,费氏对义和团确怀有一种“最大的敌意”,在他眼中,拳民之流与“汉之黄巾”、“宋之郭京”属“同一妖异”,“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识者早知祸乱之萌,岌岌可危也”。对于清朝昧于外交,轻率宣战的举动,他是极度不以为然的,认为“彼早有布置,非率尔操觚,而我中国绝少未雨之绸缪,事事落于人后,安得不一败涂地耶?”《庚子北京避难记》中并曾援引国际公法,指责围攻使馆鲁莽灭裂,殊非得计:

禁城中竟开战场,枪林弹雨中,不知误伤多少人命,亦千古未有之奇祸也。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是古今通例,况万国公法亦从无攻围使臣之举,究不知此谋出于何人?

由此看,费氏思想里有其理性的一面。而与之同时,行文中又时常流露出迂腐固陋的另一面。如事变发生后,痛悔“时事之变,天象早见,予恨不习天文,见机不早”云云,甚而不嫌琐细地记录了一桩异事:

都中有一外国人,在中华已二十年,夙谙天文,并好历数,平日不预外事,用一庖人,极赏识之,相随十年矣。今年三月间,该夷忽令庖人结清帐目云:“我即日回国,尔相随多年,须重赏酬之”。庖人问故再三,方晓之曰:“予近日观天象,中外有兵起,不但尔中华受害,我外洋人亦有祸及,予既不干外事,须早回国,迟则不及,尔无事亦可早出京,不必留恋,并不足为外人道。”该夷遂于四月回国,庖人亦疑信参半,及乱起,方告人,知此言

^①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翦伯赞序,第2页。

不谬。予有仆人牛祥,荐于大学堂教习者,与该庖人相识,故得闻此言。

在今人看来,此说当然近于无稽,费氏却还慎重其事地大作了一番评论:“可知倡乱之起,必先上现天象,特梦梦者不察耳。亦可见何地无才,外夷中未必无人也。”可见其人出于阅历和知识的局限,选择性解释时事的一种取向。

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费德保在文中屡述与同乡京官间的应酬往来,记载的频次和篇幅,甚至要超过同时正发生的重大时事,据此可窥京官群体中乡缘社交圈之重要,对于今人体味晚清官场之生态亦多有助益。与著有《庚子日记》的翰林院编修华学澜(1860-1906)类似,费氏于当时的地位并非显要,所交往的也多半是当时北京一些中小官僚,而他对义和团运动的即时反应,却正可以代表那一些官僚士大夫的意见^①。他在兵部当差将逾二十年,仍不过一主事,可谓仕途蹉跎,本来想“再二三年可望补缺,便就截取,归直隶州班分发到省,以一官为废员之计,别无奢望”,然而世情变幻,大波突起,“岂料变生意外,遭此寇乱,名心更淡”。自庚子年末,归里闲居,费德保便绝意于仕进,而多致力于乡邦事业。从这一角度看,《庚子北京避难记》不仅有费氏所见与所闻,提供了有关庚子事变研究的新史料,同时也有费氏本人由官而绅的一番转变,提示了庚子事变更为深远的影响。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①丁则良:《华学澜的〈庚子日记〉》,丁则勤、尚小明编:《丁则良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